

中国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历史考察（1917—1927）

冯用军¹，赵雪²

（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2. 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这一科学理论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紧密相连，促进了世界格局的改变。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工人队伍之中，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报刊宣传、建立工人学校、创办工会等形式推动开展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关键词] 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报刊；学校；工会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2) 01-0052-07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最进步、最革命的新兴阶级诞生了。创办于1898年的安源煤矿是中国近代工业“十大厂矿”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创建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为在党领导下迅速走上中国革命舞台、成为毛泽东确定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奠定了充分的阶级基础。回顾历史，“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群体的思想解放，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为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自此，中国革命的发展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本文选择1917年至1927年工人运动状况，是因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此中国开始向俄国学习，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

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在1927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也陷入低谷，革命暂时转入低潮期。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世界面貌的变革。机器大生产催生了工厂制度建立，新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与农村和手工业的天然联系，只能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在利润第一的工厂制度下，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劳动的主动性、创造性逐渐缺失使得劳动开始“异化”，甚至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也卷进劳动力市场。为了改善生活待遇，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但初期的工

[收稿日期] 2021-09-2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煤矿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研究（1911—1927）”（HB20DD002）

[作者简介] 冯用军（1980—），男，四川安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政策与评估。

人罢工觉悟很低,除单纯地指向机器外,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理论的渴望,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各国工人组织,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开始思考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出路,用科学方法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指出了全部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尤其说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和动力。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主体“人”是桥梁,教育的作用尤为突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向工人阶级提供的最好的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需要有知识的积极分子把科学的、革命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人阶级接受理论教育的程度也将决定工人阶级的未来,“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2]。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出发,经系统分析经济要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理论的立足点,争取无产阶级拥护这一理论信念,所以必须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

1840年2月7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英国伦敦成立,后通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作为德意志工人团体和团结工人的统一战线,该协会最终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注重对工人加强理论教育,宣传共产主义。1848年2月,在该协会举办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时,亨·鲍威尔说道:“无产阶级的多数只有受到教育和团结一致,胜利才肯定属于我们。”^[3] 1850年至1851年,该协会举办政治经济学讲习班,向英国工人阶级讲授《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办,以团结教育工人阶级为主,广泛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德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体育协会”“妇女协会”“选举协会”等组织和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引导工人积极参与到为他们自己解放的斗争中来。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推动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

在整个欧洲无产阶级意识觉醒时期,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相继建立,作为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媒介——报刊,成为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注重本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组织创办的报刊,从办刊的宗旨、原则、主题设计上都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如《德意志—布魯塞尔报》《北极星报》《改革报》《新莱茵报》,以及《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等,这些报刊都成为当时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渠道。恩格斯曾说:“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他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4] 在加强工人阶级理论教育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从实践出发,依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育策略,还强调教育者一定要先受教育,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19世纪90年代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萌芽。1895年,列宁组织成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奠定基础。协会成立后,工人组织员开始和各工厂建立联系,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励工人在争取经济斗争的同时,要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虽然《工人事业报》未能出版,但为后期的《工人思想报》的发行铺垫了道路。报刊成为当时工人表达愿望和诉求的主要阵地,它帮助成立工人组织,推动工人运动发展。1900年,列宁创办《火星报》。这份报纸引领工人运动走向历史的前台,开始成为运动的有力发声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5]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启发了苦苦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将眼光转向俄国,思考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变化。

二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京津冀工人群体中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到了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外国资本家、军阀政府、封建行帮等的压迫下,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在逐渐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要摆脱封建制度和官僚资本束缚,日益需要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上升为“自为阶级”。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苏维埃政权紧紧依靠工农大众,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对于处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中国人民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8期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高度评价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中国的五四运动,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新希望,他们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意向地开始赴苏留学,如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这对于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与作为北方工业中心的天津,加之唐山为代表的冀东工业能源基地,三个地域的工人状况具有关联性和互动性,在李大钊等人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当时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工农群众中,了解生产生活,开展理论教育,为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做出了思想引导。北京地区《劳动音》《新青年》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科学理论的宣传为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17年11月11日,天津《益世报》开始报道十月革命的相关动态。此后,该报不断刊登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促进了当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进步团体——觉悟社,并出版刊物《觉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谌志笃发表的《烟筒》一诗,就能反映出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及思想动态。唐山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区,聚集着几万产业工人,又有早期工人斗争的基础,因此备受李大钊等北京革命知识分子的关注,很快成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团结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陆续派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李树彝等到唐山,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5月1日,全国多个城市因纪念五一劳动节而举行集会、讲演和示威游行等活动,参加的工人高达五六万人。《新青年》为纪念五一劳动节设专号,曾发表过如《五一运动史》(李大钊)、《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陈独秀)等重要文章,过半数的篇幅刊登了反映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武汉等地也很快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萌芽,主要任务就是广泛地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阶级基础。

三 早期京津冀地区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初心和使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434}工人阶级群体伴随机大工业而产生,其生存状况使工人的教育、工人运动的条件和性质具有时代的特征,就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而言,还是要以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为目的,为进行社会革命打下基础。

(一) 启发工人觉悟——创办报刊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非常重视工人报刊出版工作。当时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和后来党所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大都创办了专门向工人进行宣传的报刊,大大启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劳工周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国内的工人运动,帮助工人建立革命的工会组织,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各种革命斗争。1920年11月

创刊的《劳动音》，在发刊词中曾指出：“要增进普通劳动者的知识”，被称为“劳动者的喉舌”^{[7]29}。这本杂志旨在促进工人团结，以事实为依据，唤醒、教育工人阶级要提高觉悟，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较聚集的地方很受欢迎。1921年中共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每期销售量多达上万份，1922年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及时刊登和报道各地工人活动，如《长辛店工会的近况》《谁是工人之友》等文章，从理论走向实际，激发了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强烈决心。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传播过程中，进步青年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为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劳报》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该报注重宣传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同时刊登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文章，宣传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天津工人群众自1920年起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五一劳动节，《妇女日报》曾出版“五一纪念特刊”，阐述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展示工人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工农群众以很大的启发。1924年7月，天津总工会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工人生活》，在避免查封秘密传阅的情况下，同样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明灯，广大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发出声讨。1925年7月，天津地委创办《工人生活》，专门向工人报道国内外新闻，号召工人们“要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7]29}1926年1月，天津总工会创办了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工人小报》，从维护工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刊登时事消息，宣传政治常识，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斗争的热情，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共北京区委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确定唐山为开展北方工人运动的重点城市之一，并先后不断派出干部来唐山开展工作。唐山的工人运动的起点是以京奉路唐山机车车辆厂（南厂）为先导、以开滦为重点开展起来的。1920年，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和矿山，其调查报告《唐山劳动状况》，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了解唐山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真正达到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目的。1921年12月，工运领袖邓培创建了唐山工人图书馆，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在这期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送来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

《每周评论》《共产党》等进步书刊供工人阅读思考，工人图书馆在当时成了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的基地。工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冲破了思想上封闭状态，促进革命意识的形成。

（二）提升工人素质——创办工人学校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8]，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9]，多写一些“使一般劳苦社会”^[10]能够看得懂的文学作品，让工人了解中国与世界。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组织工会活动，实行“工读互助”。1920年3月，北大“平民讲演团”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虚心向工人学习，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1921年元旦，为专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邓中夏和张特立等青年一起创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设相关知识课程，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在补习学校中，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对工人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根据工人的不同特点，制订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更加高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方建立的最早的一所工人学校，通过办学，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补习学校的环境支撑很容易灌输到工人中去，通过理论教育，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团结和凝聚工人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变为解放自身的武器、为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

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紧邻港口，交通发达，工人阶级人数较多。党中央在天津成立天津地委后，决定首先把重点放在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9月11日，李大钊派知识分子安体诚、于树德在天津创办了工人工余补习学校。该学校是马克思主义与天津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重要标志。学校共招收工人学生有上百余名，教员在讲授文化知识外，还通其他方式（走访、谈话、报告等）通俗地向工人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十月革命为例，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启发鼓舞工人们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1922年3月，在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授意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补习学校内成立，团支部专门设立劳工部，为研究工人运动的动态提供平台，劳工部在向中央递交开展天津工人运动的报告中还提出了设立工人教育机

关、提倡消费合作社等先进性建议。直到1924年,天津陆续创办了30余所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加强党与工人的普遍联系,这种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2年4月,由林西机器厂工人孙家耕、赵玉亭、郭润航、朱金华等人发起,在唐山开滦矿成立了“工余补习社”,这是开滦工运史上第一个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群众组织,参加者均为井上技术工人,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利用补习文化、学习技术的形式,帮助工人学习革命知识,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工人们经常讨论有关切身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争取改善待遇。邓培还通过工人图书馆经常向“工余补习社”寄送党、团宣传材料。该社很快就成为团结教育工人的“俱乐部”。正当革命组织开始在矿区萌生之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来通告,要求开滦派工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唐山矿工人邓汝明代表开滦五矿工会参加了5月1日至6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大”,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给开滦工人以极大的激励,使他们参与革命的热情普遍高涨起来。

1922年6月初,工人图书馆中的开滦工人骨干建立起唐山矿工人夜校“大同社”,办社的宗旨和内容都与工人图书馆相同,由李昂(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干部)来讲解全国工运形势和革命道理。同时,大同社也组织工人阅读党的书刊,如《新青年》《劳动周刊》等。大同社虽然只存在了三个多月,但它依旧是早期教育、团结开滦工人的学校,成为开滦工人党、团组织诞生的摇篮。从此,党的组织开始在开滦矿工中发展。1922年7月,邓培还创办了铁路工人补习夜校,附属于唐山工人图书馆。参加夜校学习的青年工人超过百人。邓培派共产党员阮章担任教员,李树彝和唐山大学的进步学生也在夜校讲过课,不仅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工人周刊》和《先驱》是夜校常用的教材,每晚讲解两小时。夜校里开设英语课、制图课、算术课和社会学识课,讨论过许多问题,如劳工神圣、工人斗争、工会组织等。

(三) 创建工人家园——成立现代工会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开始组建起了工人组织,旧式行会、帮口已经不能适应工人阶级斗争发展需要,在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引导下,现代工会应运而生,通过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

员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于1921年5月正式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即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北方铁路各站都派代表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回去后也相继建立了俱乐部,对北方各地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22年陈为人、陈乔年创办南水关工会;1923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团结工人力量,鼓励工人要勇于斗争;1925年,党以印刷工人为主干创立北京工人俱乐部,同年成立“北京总工会”。虽然革命工会在创建初期规模不大,数量也不多,但它却是建立中国工人阶级新型工会的样板,工人开始逐渐正确地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支持下,1921年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天津成立支部,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的传播进入运用理论指导革命的阶段,工人运动逐步形成规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5年,纺织行业北洋、裕元、恒源等各厂相继成立工会,推动“天津纺织工人联合会”建立。现代工会成立之后,天津各界的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如天津海员、码头工人、纺织工人等罢工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天津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

为促进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12月,张国焘到唐山,与邓培等人讨论决定在基础较好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建立工会组织。1921年1月,邓培对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联合会进行改组和整顿,严格规章,将其转变为谋求工人利益的工人群众组织,后改称京奉铁路机务处职工会,也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2月,工会成立大会秘密召开,选举邓培、陈文海、王麟书等9人为委员。工会的建立,标志着唐山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和教育下,开始步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的新阶段。

四 早期工人阶级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有效形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京津冀的工人运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理

论指导,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对社会革命有了科学认知,逐渐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

(一)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

早期工人运动的客观实践又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觉醒的现实需求下,工人阶级积极寻求自身解放,这股力量团结起来使全国的产业工人在思想觉悟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要求成立自己的阶级组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党成立之初也确实把主要精力放在团结工人阶级、发展工会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百年来正是由于党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才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二) 培养了大量优秀党员与工人骨干参与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开来。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通过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建设、开展工人运动等方式,工人阶级一方面开始逐步提升思想觉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工人运动的高涨可以说明工人阶级历史主动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一脉相承的。

李大钊提倡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在产业工人队伍中选拔积极分子,培养工人队伍中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组织基础,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工运领袖邓中夏,深入工人群众,对工人进行理论宣传和教育,领导了长辛店工人运动;天津出的第一批工运领袖,如李培良,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负责人之一,他领导和发动了1925年天津工运史上最早的五一大游行,为“五卅运动”期间天津工人运动高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山地区的工人领袖邓培,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于1921年参加了在苏联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并获得了列宁的接见。1922年10月,邓培参与组织领导了开滦煤矿五矿3万余工人同盟大罢工。

(三) 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后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是党在成立20年之后从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结论。早期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工人运动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发展工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宣传形式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又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和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内涵,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敢于坚持真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能力。

早期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理论宣传教育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其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阶级的实践向理论工作者反馈实践的具体效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革命最终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
- [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55.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9.
- [5] 列宁. 列宁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3.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5.
- [7] 钱承军.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版社, 1999: 230.

[8]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N]. 每周评论第 21 号, 1919-03-09 (001).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95.

[9] 劳动教育问题 [N]. 晨报, 1919-02-14 (002).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M]. 北京: 人民出

(责任编辑: 孙永泰)

Research on the Marxist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17 – 1927) —— A Study Based o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ENG Yong-jun¹, ZHAO Xue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Marxism theory, born in the 1840s, is an ideological weapon for the proletariat's liberation. This scientific theor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romotes the change of world pattern.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enter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arena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force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politically conscious intellectuals began to join the ranks of workers to teach and disseminate Marxism among working groups. They promoted workers' movement. by publicizing via newspaper, setting up schools for workers, establishing labor unions, etc., which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of working class and a solid class basi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working class; educ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chools; labor unions

(上接第 51 页)

On the Return of Labor Education to Family from Sukhomlinsky's Educational Thought

SHAO Xian-ping, XU Xi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labor education in schools ushered in a new wave of upsurge.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 "labor education as a whole"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However,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labor education, the family aspect is often forgotten and lost. Sukhomlinsky is a famous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 and educational theoris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many family elements are included in his thought of labor education. When we look at Sukhomlinsky's educational thought, w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but should broaden the educational channels available,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cessible to most children, and form a complete educational ecology. In terms of the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returning to the family, we need to realize inter-subjective education, take the correct view of labor as guidance, and integrate all educational forces to make children grow up in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labour education; Sukhomlinsky's educational thought; intersubjectivity